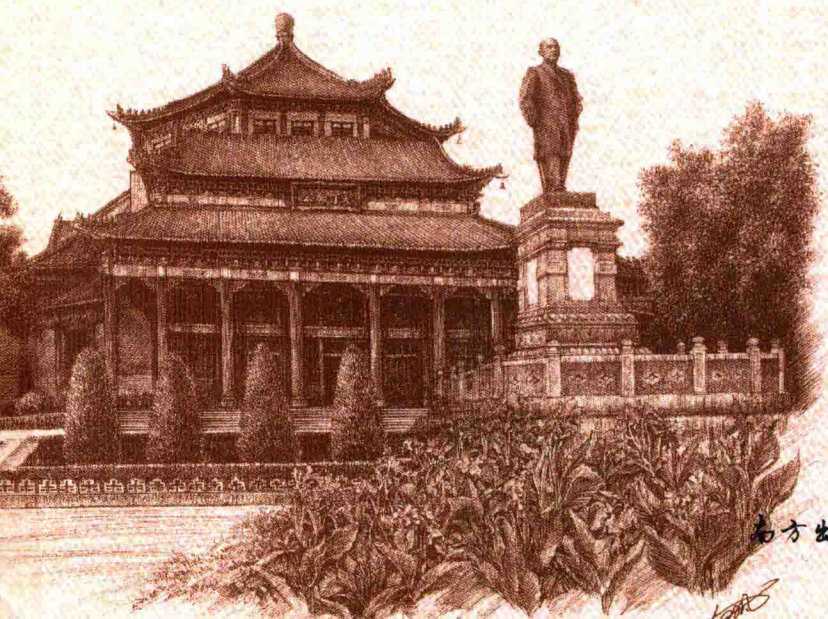


從孔子到

孫中山

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研讨会论文集

孙中山基金会 编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從孔子到

孫中山

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研讨会论文集

孙中山基金会会 编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孔子到孙中山：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研讨会论文集 / 孙中山基金会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218-09545-5

I. ①从… II. ①孙…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452 号

Cong Kongzi Dao Sunzhongshan

从孔子到孙中山

孙中山基金会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 莹

责 任 编 辑：王俊辉

装 帧 设 计：书窗设计室

封面钢笔画：白 筑

责 任 技 编：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9545-5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540 千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020-83791487 邮购热线：020-83795749

序

世纪伟人孙中山最早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呼声，在漫长而坎坷的历史长河中，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而奋斗不息；他锲而不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丰功伟绩彪炳青史。

人们不会忘记：孙中山为了民族振兴而兼收世界文化之长，创立了顺应世界潮流又合乎中国国情的革命学说；为了改变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以愈挫愈奋的伟大精神，领导中华儿女进行武装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远大理想，他构建了系统而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为了事业的顺利进展，他高度肯定民族文化在民族振兴中特有的功能，以开放的文化理念与实际行动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

孙中山是感召海峡两岸以至全球中华儿女的光辉旗帜，其思想超越时空，成为当代中华儿女的宝贵财富。研究、宣传与弘扬孙中山思想，中华儿女责无旁贷。孙中山基金会、上海中山学社和台北国父纪念馆，均为以孙中山命名的组织机构，肩负着研究、宣传与弘扬孙中山思想的历史职责。为此，多年来都积极组织和推动孙中山研究和学术文化交流。2011年8月，在上海，孙中山基金会提议搭建一个平台，以使两岸对孙中山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化交流得以经常化与制度化。经商议，三方一致同意每年组织一次联席会议，三地轮流召开。当年12月，这一动议正式确定，并规划了会议的基本模式，计划2012年在广东首次召开。

三地联席会议的首届学术研讨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2012年的金秋时节，在广东大儒陈献章与文化巨子梁启超的故乡、广东儒学圣地、明代心学策源地广东省江门市召开。会议以“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为主题，既拓展孙

中山研究的视野，也深入探究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杰出贡献，更能服务于两岸和平发展。

来自台湾、上海、广东以及其他各地区的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 38 篇，论文围绕会议主题，以宏观或微观的视角，阐述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与价值理念，梳理从先秦诸子百家到近代孙中山，绵延两千多年的演化，揭示这些核心理念的当代价值。其中不少论文展示了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论述其思想与当代现代化建设的密切关系。孙中山因袭中国传统文化、撷取西方先进思想，形成自身的创获，从而构建其三民主义学说。三民主义不仅是当时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在当今社会建设还具有现代意义。其学说对“天下大同”、“王道文化”、“仁爱”等理念的宣扬，对传统“民为邦本”、监察与考试制度，以及“均富”思想等的承传，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不自觉的承传与弘扬，也是对今人的启示。

文化，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维系生存与发展的根和精神动力。孙中山曾告诫人们，要振兴中华，首先要振奋民族精神，而要振奋民族精神，则须恢复“固有道德”、“固有知识”和“固有能力”，孙中山是何等之注重中华文化在民族振兴中的作用！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明显薄弱。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思潮冲击下，孝亲重德、注重诚信、关心集体等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不断被侵蚀，人心浮躁、道德滑坡事件屡见于报端。失去民族文化的依托，强国崛起与民族复兴将难以实现。

通过对“从孔子到孙中山”的探讨，以及对历史的考察，对现实社会建设需要审视，以见中华文化如何在新时代里发展与绵延，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重要问题，不得不予以关注。从孙中山推进儒学以至整个中华文化转型中，人们可得到宝贵的启迪：民族文化并非固定不变，而要与时俱进，她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以外来的先进的价值理念来丰富自身，以社会实践所升华的富于时代气息的思想观念来促使自身的进步，从而顺应时代潮流并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有必要着力于发掘、整理与揭示中华文化所蕴涵的永恒价值理念，使之与当今的社会核心价值相整合，使之成为当代社会建设的可直接利用的精神资源与动力。

孙中山基金会第二届理事长 石安海

目 录

传统文化与孙中山

孙文学说的文化取向	张 磊 张 苹	3
从孔子“仁爱”到孙中山“博爱”		
——略论“仁爱”观的演进及其普世意义	黄明同	17
孔子和孙中山 两位成功的政治教育家	刘美冰	27
中国法治思想长河与伏流探索		
——以韩非子与孙中山法治思想为题	施茂林	38
二十年来孙中山大同思想研究述评	章义和	72
孙中山经济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钟祥财	81
孙中山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张晓辉	90
孙中山所引古文古语考释（辛亥革命前后）	严昌洪	101

孙中山思想与实践

论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林家有	115
从理论到实践		
——孙文学说的时代意义	谢孟雄 郑美华	125
孙中山与章太炎在社会激变时期思想轨迹比较研究	蔡宏俊 华 强	140
孙中山的南洋革命组织：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	邓志松 卢怡如	150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的心绪与行迹	廖大伟	165
孙中山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的历史反思	谢俊美 任念文	177
孙中山与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	刘碧蓉	182
论孙中山与客家运动	邱荣举	192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论议	方 平	196

孙中山对文明与民生如何并进的探索	程 潮	213
从孙文的教育理念说现代教育要旨	刘源俊	222
孙中山教育思想对台湾教育发展之启示	唐彦博	231
重新定位与渐次改造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宋德华	251
孙中山提倡开放主义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翁嘉禧	255
孙中山的助人哲学	黎建球	272

传统文化与制度的近代变迁

试论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刘宗贤	285
儒家德治传统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前瞻	彭立忠	296
白沙心学与岭南化儒学	刘兴邦	309
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信仰	宁新昌	317
张之洞、梁启超“中体西用”思想之比较	谢 放	325
清末民初“三从四德”之动摇	李兰萍	336
政治不信任与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试验	严 泉	351
辛亥革命的政治经验	何晓明	359
教育学术团体的转型与发展		
——以“中国训育学会”为例	周家华	370

传统文化与孙中山

孙文学说的文化取向

张 磊* 张 苹**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的文化取向愈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领袖人物（在近代则往往组成为群体）以及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和政府采取的文化取向，更为如此。在根本意义上，文化取向关乎国家、民族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导引、制约与架构着未来社会的走向和模式。文化取向的内涵当然是广义的，而非囿于狭义的范围，它对变革与建设起着导向作用，涉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内容。毫无疑问，人们制定与遵循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体制和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取向所塑造与成形。

剧变的近代中国处于转型期，文化取向显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人士、政党乃至阶级，都必须有所抉择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封建末世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缺乏及时产生正规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土壤。在中世纪末叶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颇为强固，“宰制于上”的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封建主义文化体系君临。新的经济成分及相应的先进思想的产生，自是十分困难；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虽然分解着的社会机体给新的经济成分提供了某些条件，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阻抑着新经济因素和钳制着“新思潮”的发展。归根结底，存在决定意识。

严峻的形势，向探索和发展中国道路的仁人志士尖锐地提出了文化取向的课题。首先，他们必得向西方寻求真理——正规的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在引进过程中必须有所分析、辨别，更需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即是中国化、增加民族的元素。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无疑都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他们必须因袭传统文化。但是，这种承传定要以科学准则和时代精神作为扬弃的依据。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不加分析与批判地一律摒弃或全部接受传统文化，都是不足为训的。由于封建

* 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张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专制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和盘根错节，所以，与之首先采取一定程度的疏离态度，并进行民主主义启蒙就成为变革的思想前提。要之，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在锻造自己的战斗纲领时必须对文化取向的中外古今关系加以科学解决，做到“兼收众长，益以创新”。而中国化、时代精神所导致的当代中华元素，即为这种文化取向的正确准则。

孙中山所持的文化取向，显然是他留给后继者的宝贵精神遗产。在当前新旧世纪交替和经济与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的历史时刻，仍然兼具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有规抚欧洲之学说”；反对“极端的崇拜外国”和“一味的盲从附和”

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不愧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光辉代表。他曾经把自己思想的渊源归结为三个方面：西方、传统和“创获”。但是，综观孙中山不断进取的毕生的理论活动，从西方吸纳先进思想，无疑是他文化取向的主导之一。

孙中山制订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其基本内涵来自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把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等同于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类比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他的三民主义的核心部分——民权主义理论以及政体架构，主要是借鉴近代欧美的“共和制度”和“代议政治”的观念与实体，虽然，祖国的传统文化亦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古代中国某些政治思想的因素和政治制度的环节，也被改造与糅合在其中。孙中山在解释他的共和理论与方案时曾明晰地指出：“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西方代议制的共和国模式，成为他长期奋斗的主要目标与效法楷模：“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①他甚至确认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自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②他在晚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对西方的代议制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把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但其基本政治观念和构想基本上仍未脱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窠臼。至于孙中山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土地与资本而倡导的民生主义，更多的也是借鉴于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与“资产阶级土地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有论者”约翰·穆勒以及亨利·乔治的学理的明显构成因素。

孙中山在阐述其革命纲领的时候，多次明确谈到他的思想与学说的主要来源：“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① 特别重申“民权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②。他把三民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进行了比较，认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大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③ 孙中山之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是由于“欧美近一百年来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④。在他看来，这种吸收、借鉴是十分重要的，绝非可有可无：“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⑤

列宁曾对孙中山这种文化取向给予极高评价：“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⑥ 同时，充分肯定了他“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的作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作为中国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化取向反映了这个阶级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广度和高度，无疑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

剧变的时代——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日益明显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蓬勃展开，不能不引起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人士的深思，于是，他们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吸收。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积极传播“新学”，希望经由自上而下的温和方式进行社会变革，促进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并在1898年实行了变法的尝试。但是，甚至这种“跪着的造反”也遭到了顽固派的镇压。康有为等流亡异域，但给予他以更多了解西方社会的机会。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大同书》思想庞杂，但空想社会主义无疑是它以及较早写成的《礼运注》的重要内涵。康有为以救世主的姿态允诺了一个大同世界，在那里“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国界”、“家界”、“产界”、“级界”以及“形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1页。

⑥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界”等等均被破除，甚至具体细微到对未来的厕所都作了设计。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大同理想，带有时代的特色。他接触了资本主义并观察到它的缺陷，所以在瞻望未来时提出“农工商业界归之公”。意味深长的是，康有为受到了《乌托邦》一书和傅立叶的影响。当然，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只能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近代中国进步社会思潮的特色之一，即几乎一整代“上下以求索”的志士都对社会主义给予关注。

孙中山在这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他在引进西方民主主义时几乎同步地受到了社会主义各流派的影响，吸收了许多相关因素，成为他的民主主义的重要补充。这既是时代的反映，更是他激进的追求精神使然。早在1896年流亡伦敦遭到清驻英使馆绑架，脱险后的孙中山在那里逗留了约半年的时光。他除了撰写《伦敦被难记》一书外，还认真读书学习和考察体验了西方社会。他几乎每日均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阅读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程等方面的书籍。那座馆藏丰富的图书馆的圆形阅览室，也曾留下马克思、列宁的足迹。他还参观了宪政俱乐部和国会。伦敦和英国各地的无产阶级不断举行罢工。不少斗争遭到了军警的镇压，令他十分同情。伦敦东区——包括孙中山居住的霍尔本区的贫民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显然，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进一步了解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思：“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三民主义至此初步形成，亦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因素的一种吸收。尖锐的事实是，孙中山在使自己的祖国“走上了西方的道路”时，却愈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溃疡比比皆是：垄断组织形成，贫富两极分化，民主制度弊端丛生……同时，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兴起。所以必须在学习西方时也“思患于预防”，“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并非偶然，只是为了强调“民生”的意义，才将英文的社会主义译为汉语民生主义。他多次宣称自己是“完全之社会党”，希冀与政治革命同步实行社会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的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纲领和有关文件中，重申了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原则：“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至于土地与资本则成为首要课题：“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核心为“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加，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有共享”。节制资本——“国家社会主义”的要义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1）个人企业，（2）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方案，实际上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力求快速实现近代化的构想。他

的土地纲领可以“摧毁私有者的垄断”与消灭“绝对地租”，得以“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同样，节制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也意味着早日实现工业化，即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双重积极作用，使之各得其所和各尽其能。毫无疑问，土地国有和企业的国有化，并不一般等同于社会主义，它们的性质主要取决于所在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制度。

孙中山与社会主义者交往频繁，曾于1905年春在布鲁塞尔访问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他向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提出接纳他的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要求，并且“简要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即除了“反满”外，“要使中国的土地全部或大部分公有”，借以“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后来，他还与胡斯曼有过信函往来。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优良特色，在于力求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化、近代化的大生产之上。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巨人深知历史“进化程序”是“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步步前进，永不退后……断不能废除现世之文明进步而复返于原始状态也”。既然如此，“故实业主义行于我国也必矣！”孙中山不同和优于俄国民粹派以及许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没有在近代文明前表示恐惧和伤感，而是——如列宁所指出的——“承认生活所强迫他承认的东西”，抛弃了那种“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他在20世纪开端时展望祖国的未来，确信“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在后来的《实业计划》中更绘制了一幅中国近代化的宏伟蓝图——修筑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整治长江、黄河、珠江等；疏浚和开凿运河；建设三个世界大港、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和十五个渔业港；改建和增设大批城市；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机床、造船等大型工厂及食品、纺织、建筑等类企业；改良农业、营造森林和移民垦边……孙中山非常理解工业化、实业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积极主张引进近代西方产业的要素，“吾之意见，盖于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化前驱，祖国臻于富强是他的理论和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然，这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念中的科学成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还存在和表现为预防与消除资本主义的祸患。他以西方为鉴，确认“私人之垄断，渐变出资本之专制……是工业革命之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大多数。”因之，必须“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的大毛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真诚而又天真地宣称：“夫吾人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反对私人垄断，消除两极分化乃至剥削，以“共富”为目的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基本特征。

当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带有主观的因素，主要是他把中国社会经

济的滞后视为社会革命与民主革命得以同步进行的条件，认为中国社会只有着“大贫”与“小贫”的分别，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劳资对立方露端倪。由于“中国的工业未发展，资本主义尚未抬头，一般大众服从而守法。因此这个国家可以轻易地塑成任何形状”。事实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空想与主观性就在于他的土地方案与资本构想实质上难以“防患于未然”，而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内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才既能够发展社会化、现代化的大生产，又可避免资本主义的各种流弊，真正做到“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调整发展社会经济，“所得的利益归人民所有”，关怀备受压榨的农民和工人……这些善良的愿望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才能真正实现。至于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则是“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当前任务的努力”。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才辩证地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孙中山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就在于此。

正是由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科学成分与积极因素，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主要是朱执信对科学社会主义倍加赞誉，十分钦佩社会主义的“泰斗”马克思，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等流派。在1912年热衷于宣扬民生主义的日子里，孙中山于10月应中国社会党本部的邀请连续作了三次评论社会主义及其派别的演讲，十分称道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粗浅激烈之言论也”。迄于近年，“于是社会主义遂放光明于世界也”，希望“我中华民族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朱执信则是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士之一，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节译和概述了《资本论》的要旨，认为“故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不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而对于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则往往缺乏辨识。直到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推动了北伐战争，才在实践中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称赞列宁为“革命的圣人”，强调必须“以俄为师”，反复申明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以为民生主义包括了社会主义。当然，这种政治上的良好合作意愿中仍掺杂着非科学的成分。但是，也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化的必然前途似乎合拍。

事物总是复杂的，绝对化往往使观察和论断流于偏颇。空想社会主义中包括科学成分，科学社会主义也难尽除空想因素。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歧异，但在一定条件下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壁垒。这种状态，明显体现于孙中山一身。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兼有科学与空想成分。他的民主主义理论也有所突破。当然，孙中山思想在总体上仍属于民主主义范畴，因为他未能客观认知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

从理论到制度，并且带有主观社会主义因素。

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兼具革命性与科学性。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和生根、开花、结果是在1919年前后。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破封建主义之旧、立民主主义之新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开始转变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启蒙运动。这是又一次伟大思想变革，也是近代中国文化战线的飞跃。初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的优秀分子认识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理解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变化，开始了新的探索 and 追求，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批热切追求真理的青年，也很快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代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骨干：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阐发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从此面目一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历尽艰难困苦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被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桎梏而贫困落后的近代中国来说，获得拯救与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而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它们接续构成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时期——三个阶梯，只有循此奋力攀登，国家才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然而，刚刚从中世纪末期脱出的中国社会，民族资本在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萌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又使这种新的内在因素发展得十分缓慢迟滞。资产阶级出生后就发育不良，非常孱弱。较早出现的无产阶级的成长，也受到社会存在的多方制约。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代表人物不可能及时在中国创造出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然而，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危机，促使一切怀有救国拯民愿望的先进人士迫不及待地实际出发，对西方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实行“拿来主义”。他们不畏艰辛向西方寻求真理，借以促使神州大地宛如凤凰涅槃般在革命与建设的火焰中新生。这个历程是曲折复杂的：引进和熔铸完整的民主主义理论，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从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孙中山出色地完成了这桩历史使命，成为那个时代的旗帜；他在后期政治生涯中迎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把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提升到新的高度，依然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推进了历史的行程；他还对社会主义也做了研究和吸取，其中不乏科学成分与积极因素，并且力求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他未能完成这桩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时代的重担，经过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走向光辉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舍此别无他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不愧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伟大先驱者。

孙中山在“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时，他的文化取向表现出的优点和特点，还在于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始终根据基本国情与拯救、发展自己祖国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与取舍，而绝非不问青红皂白地生搬硬套。他尖锐地批判了“极端的崇拜外国”、“一味的盲从附和”与“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的心态和论调，^① 认为这是错误和不足取的。

孙中山从实践中——特别是在后期活动中越来越察觉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因而在引进时采取分析辨别而非肯定一切的态度和方法。他不断地阐明这个尖锐的事实——“欧美政治的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之，“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断言“现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主义之弩末”，^② 例如“像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③ 这是因为：第一，“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第二，西方现行的代议政体“弊害丛生”，现代的代议士们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贪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进一步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④ 所以，“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⑤ 孙中山还以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与西方的代议制对比，认为他还只是粗浅了解的“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⑥

孙中山在吸收外来先进事物的时候，非常强调要尊重中国的国情。对于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的吸取，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熔铸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决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特点而照本宣科。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要“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能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他的“五权宪法”的主张，就不是模仿西方的“不太完全”的“三权分立”方案，而是参酌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加以改进演变而成。他认为英国“虽然是立宪的鼻祖，但是从来没有成文的宪法”，“三权分立”只是原则，迄今“实在是一权政治”。美国宪法不仅“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而且“不完备的地方”和“流弊也很不少”，致使“黠者得乘时取势，以售其欺”。甚至还会因议员擅用纠察权“挟制行政机关”，形成“议员专制”。孙中山把“五权宪法”视为结合中国社会政治实际而引进西方政治方案的创举，甚至以为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

② 《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0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